

党的自我革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王春玺 丁亚龙

善于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有的科学态度。执政规律是执政党为巩固执政地位而在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之间形成的具有内在本质性的必然联系和发展趋势。共产党执政规律主要包括执政理念、执政目标、执政方式等内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党的长期执政为执政目标,不断创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在新时代十年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在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标志着党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新的自我革命,为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作为“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这条规律性认识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是决定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揭示了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打铁还要自身硬。能否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长期执政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党的自我革命“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可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是通过各种合法合理的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深化了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目标的规律性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二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党长期执政作为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不仅确立了多重执政目标,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实现执政目标的成功道路。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还是西方的政治家,由于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因而无法真正把握国家治乱兴衰的规律。建党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先后找到了“人民来监督政府”“党的自我革命”等两个答案。所谓“答案”就是党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自我革命是对跳出历史周期率路径的优化,深刻揭示了管党治党的内在规律,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根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还揭示了“两个答案”的辩证统一:“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党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总之,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构建了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的有效途径,深化了对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的认识。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党的领导制度、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三者关系的深刻把握,深化了对党的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的规律性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承担着领导和执政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党的领导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领地位,是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必然反映、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的战略高度,凸显了党在国家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及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领性作用”,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执政优势的认识。另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的制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可见,以党的自我革命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新时代党的执政方式适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执政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三种执政方式顺应了当代政党执政所追求的科学与、民主、法治的发展趋势,深化了对政党执政方式的规律性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取得历史性成就。在新征程中只有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性认识,才能更好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编号为21ADJ001)

深化“网格化+数字化”双轮驱动 推动基层治理更精准更高效更智能

樊惠林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安庆桐城市六尺巷考察时,强调要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以党建引领,凝聚群众力量,共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近年来,二七区立足实际,顺应特大城市发展规律,认真落实市委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工作部署,全面深化“三标”活动,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为主攻方向,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深化“网格化+数字化治理”双轮驱动,推动基层治理更精准、更高效、更智能。

一、以党建引领,增强基层治理“凝聚力”,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问题。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二七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化机构改革,成立“区级智慧城市运行办公室”,整合区级信息化平台,建立“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平台”,统筹力量夯实“一核聚多元”“一核带多元”网格队伍,重点围绕“轻车减负”“做减法”“壮马赋能”做加法,切实发挥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优化网格,变“多头分管”为“一网统管”。科学设置17个一级网格、175个二级网格、1439个三级网格、6281个微网格,逐级明确各级网格员、网格员责任,做到权责明晰、运作高效。针对二七商圈、火车站周边等人流量大、人员密集的重点区域,以基层党建“书记项目”为契机,探索专属网格治理模式,建成集“网格综合调度、经济运行分析、平急高效转换”为一体的二七商圈智慧运行平台,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力量增援、联合执法、四级预警、综合调度等工作机制,强化协同联动、数智赋能,有效保障二七商圈安全稳定。

2.聚合力量,变“单打独斗”为“组团作战”。结合实际向基层赋权扩能,在工作方式上,以

网格党支部为阵地、党员先锋带头为引领,全区48名县级领导、216名街道科级领导分级入格、定岗定责,示范联动网格内各种力量资源,破除条块壁垒,实现融合治理;在管理模式上,以三级网格体系为依托,健全网格事件闭环循环处置流程,使各个职能部门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

3.精细服务,变“群众上门”为“党员下沉”。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团结带领群众,推动城管、市场监管等15个职能部门1761名下沉人员融入网格,吸纳2018名社会组织、群众组织带头人加入网格队伍,明确236名市、区直下沉历练干部“六员职责”,深入开展“千人大走访、服务树形象”“服务群众十件微实事”“三联一创、五微共治”以及公共服务“陪帮办”等实践活动,推动10995名网格员队伍深入群众察民情、聚民意、解民忧,累计排查发现问题25594处、办结25291处、办结率98.82%,建立微信连心群1743个,覆盖群众20万余户。

二、以数智赋能,强化基层治理“支撑力”,加快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体系迭代升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与我们正在开展的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这项工作高度契合,必须坚持以党建引领、数字赋能统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推动发展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实现根本性变革。

1.以“小制度”助力“大治理”。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我们已进入数字智能化时代,务必进一步深化认识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健全线上线下联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在化解各类

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激发消费新活力

凌云兰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2.5%。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依托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化应用,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线上线下融合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有效满足人们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对激发消费潜能、推动消费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消费活力仍需进一步释放。要培育壮大各类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推动消费提质升级,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近年来,以网络购物为代表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广泛普及,推动消费快速增长。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其中网络购物用户超过80%。2023年我国全年网上零售额15.42万亿元,同比增长11%。同时,网络购物业态模式不断创新迭代,直播带货等新型网络零售模式发展势头迅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应用极大丰富了消费内容,智能家居、智能穿戴消费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即时零售、远程医疗等新场景加快拓展,据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

心预计,2023年至2030年即时零售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25%。

互联网技术普及和平台经济兴起,推动消费场景从线下到线上、消费对象从实物拓展到服务,服务消费内容和形式不断创新。“互联网+服务”消费新模式快速增长,在线文娱、在线健身、在线旅游等正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动力。2023年,在线旅游、在线文娱和在线餐饮服务销售额合计对网络零售额增长贡献率为23.5%,拉动网络零售额增长2.6个百分点。平台型和共享型消费新业态激发庞大的消费潜能,外卖配送、网约车、即时速递、共享住宿等消费新业态持续快速发展,助力消费潜力释放。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理念已向品质消费、体验消费转变,消费更倾向个性化、品质化。消费理念的转变,推动消费行为的变化,进而激发新的消费潜能。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背景下,绿色消费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绿色、低碳、环保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已成为消费者的重要诉求,带动绿色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产品、二手商品消费渐成潮流,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949.5万辆,同比增长37.9%。随着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健康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涌现,

健康食品、健康器械、运动装备、医疗美容以及养老服务健康服务需求快速增长。2024年上半年,我国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271元,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达9.3%。

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壮大为消费提质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但其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应加大破除制约其发展的障碍,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快速发展,充分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一是加强信息网络、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5G网络、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搭建优先覆盖核心商圈、重要交通枢纽、主要应用场景的高可靠、低时延、广覆盖的通信网络。建立健全数字化商品流通体系,加快布局数字化消费网络,加强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发展融合,丰富5G技术应用场景,深化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应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区域消费中心以及中小型消费城市梯队,建设城乡融合新型消费网络节点,积极发展智慧街区、智慧商圈,对消费潜能释放形成基础支撑。

二是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建设,建立高效联动、包容审慎的监管框架。针

对新业态新模式特点,顺应发展规律,加快出台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领域相关配套规章制度,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完善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实现线上线下协调互补、市场监管与行业监管联动。加大对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虚假宣传、价格欺诈、泄露隐私等行为的打击力度,着力营造安全放心诚信消费环境,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是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在培育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过程中,要更加注重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完善“互联网+服务”、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培育打造5G条件下更新场景、更美体验的新业态,形成多元化的商业模式,提升居民消费意愿,扩大消费需求。

四是增强政策协同性,形成共促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合力。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研究制定分行业分领域的管理办法,有序做好与其他相关政策法规的衔接。强化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加快制定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的具体措施。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和平台企业数据优势,加大各方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支持力度,形成促进消费扩容升级的良好环境。

实现考古资源与文化遗产现代化的路径和对策

刘文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作出了“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查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标识体系”的决定,这一决定为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发展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文化遗产的同步发展。优秀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健康的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完善的督查制度,不仅能确保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有序,而且能让根植于文化遗产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神再次焕发活力,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也是不断探索实践的现代化。我们应立足中华民族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优势,围绕“华夏文明起源”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积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深化课题研究,持续推进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探索,构建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实现文化遗产的高质量发展。

一、文化遗产现代化是构建中华文明传承体系和优秀传统文化美好未来的重要方式。

文化遗产是历史的馈赠,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中华民族历史延续、文化融合、精神汇通、信仰认同的物质见证。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以现代化建设为导向,探索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实践模式、传承方式的现代化发

展,必定为文化遗产发展注入更多新鲜活力,使其内涵外延和呈现方式更加丰富且多元。文化遗产作为历史文化资源,是表现在古代遗存上的当代价值,其价值在于它对人们认同与身份认同的贡献上。文化遗产是存在于现在的过去,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对其保护、研究、阐释、活化的理念与方式不仅是社会责任,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担当与民族精神的象征,更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表现。

文化遗产作为社会公共资源,具有鲜明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其保护传承、活化利用均无法脱离现代社会而单独存在。现代化发展让文化遗产的社会属性和公共属性更加清晰,也使得其动态的发展模式更加明了。现代化文保理念,赋予了文化遗产新的保护传承机制,实现理念、技术、方式的现代化,实现文化遗产与社会同步动态发展,使其成为国家、城市、社区等现代社会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机制无疑是对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也因此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依靠考古资源优势,让文化遗产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中华文明作为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历史的悠远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深厚的物质资源和灿烂的精神文明。同时,与全球其他地区的文明一样,为人类文明进程贡献了优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硕果。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物质遗存,彰显着中华文明鲜明的文化特征,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征也从不同的角度折射着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独树一帜的精神文化等价值体系。

立足于中国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持续推进华夏文明探源工作,以“中华文明起源”“考古中国”为抓手,加强中国考古学文化探索,推进中华文明研究纵深发展;逐步完善中国文化遗产和历史体系理论研究 and 学科建设,在世界学术体系体系中,构建历史价值、阐释体系、评价标准,形成完善的中国文明研究体系;加强中国文化遗产的阐释体系建设,发掘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夏文化、商文化、嵩山文化等多种文化遗产中中华文明的内涵和特征,以多种形式、多种角度呈现中国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文化标识;发挥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遗产标识体系中的作用,通过发掘、研究、阐释、活化等多种方式,让文化遗产的“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贯穿其中,使创新发展的模式成为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鲜明特征;科技助力,数智赋能,运用高科技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打造中国标识、品牌、符号,积极宣传,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不断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以动态理念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做好阐释和弘扬工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赓续,做出当代人的努力和贡献。

三、探索创新实践,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制和体系。

现代化发展目标让文化遗产的社会化属性与公共文化属性日益突显,让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更加完善,阐释体系更加丰富,参与力量更加多元。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弘扬需要与社会、文化、公共资源等多个角度与层面去探索实践。要实现文化遗产的高质量发展,就要秉持发展的理念,集合多元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从理念、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多个方面进行协调统

筹,在规划上不限于一时,管理上不囿于一地,从公共文化建设到大遗址法规完善,实现文化遗产的现代化发展。

中国文化遗产的鲜明特点也对遗产保护提出了新要求。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疆域辽阔,璀璨的古代文明连缀成片,层层叠叠,诉说着华夏文明的悠远。文化遗产宏观性和整体性的现代化保护理念,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文化遗产自身特征的集中体现。如仰韶文化,作为黄河流域最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就具有分布区域广、堆积积淀深、文化内涵复杂的特点。而随着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渐深入,区域性或地区性研究已经不再适合大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等大型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传承,迫切需要建立多地联合科考机制,围绕课题目标,跨地区、跨学科共同研究,实现考古学与多学科共同介入进行研究与阐释。当然,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亦同此理,“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跨越8省(直辖市)35座城市,沟通五大水系,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全长5000多公里,横跨欧亚大陆,涉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它更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明证。因此,文化遗产的协调、统筹、传承、发展是文化遗产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诉求。

文化遗产监督体系的建立在于用动态的方式构建现代化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体系。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阐释理念和传承态度是不同时代、族群、文化、信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同时,其又受制于文化、技术、理念等因素的制约。建立文化遗产监督体系,可以确保文化遗产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突显其文化功能。